

秦汉时期
《吕氏春秋》
接受研究

延娟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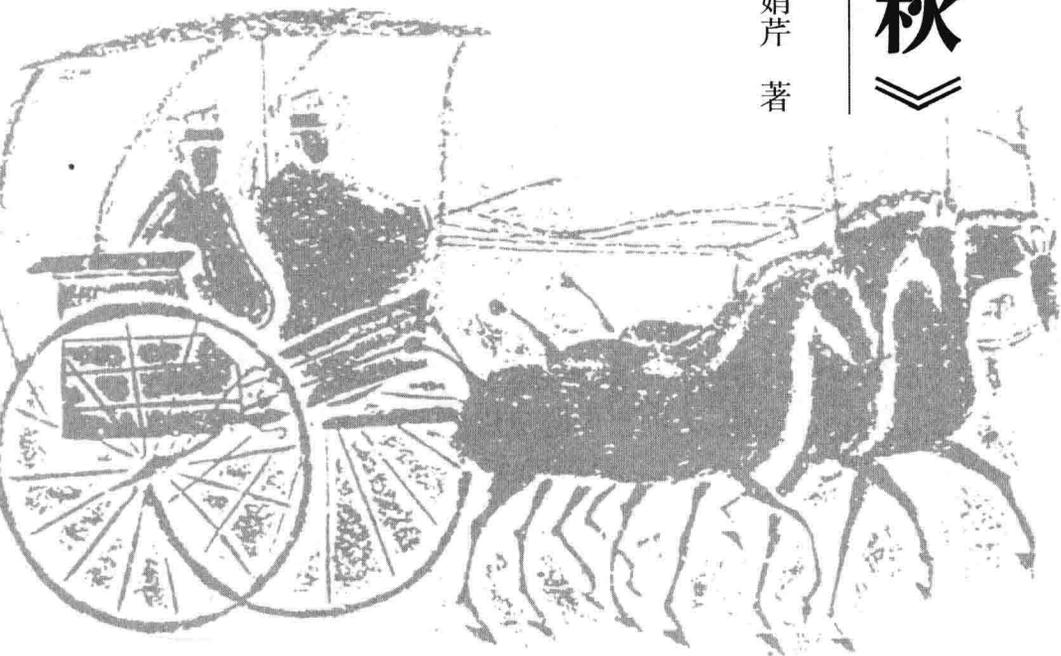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秦汉时期
《吕氏春秋》

接受研究

延娟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接受研究 / 延娟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5673 - 5

I. ①秦… II. ①延… III. ①杂家②《吕氏春秋》—研究 IV. ①B229.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16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田文
责任编辑 徐楠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54 千字
定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主持编撰的一部杂家著作，书中不但汇集了先秦诸子各派思想，对先秦文化做了综合性总结，同时又有自己的独特成就，在后代尤其是西汉产生了重要影响，《吕氏春秋》可以说是先秦文化向汉代文化的过渡。

一 前人研究综述

《吕氏春秋》自编撰成书后，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因为秦朝短命的影响，汉代学者对《吕氏春秋》多是隐形的接受，直接称引评论的并不多。就秦汉时期《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而言，魏晋到清代只有零星评点，如宋人黄震在《黄氏日钞》中曾引蔡伯尹的话曰：“汉兴，高堂生、后仓、二戴之徒取此书之十二纪为《月令》，河间献王与其客取其《大乐》、《适音》为《乐记》，司马迁多取其说为《世家》、《律历书》，孝武藏书以预九家之学，刘向集书以系《七略》之数。”^①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亦云：“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②两家指出了汉代著作如《月令》、《乐记》、《史记》、《七略》等对《吕氏春秋》的效仿与接受，惜多数论述较为简略，未作进一步的论证。

现当代有学者就《吕氏春秋》对秦汉政治、哲学、科技等方面的影响作了阐述，这里略举有代表性的几家。

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说：“《吕氏春秋》对于汉代经学，

^① 转引自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0页。

^② 《校雠通义·汉志诸子》（第十四）。

包括董仲舒的神学，有巨大影响，两者有不解之缘……实际上他们很看重《吕氏春秋》书中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学说。自十二纪首被编入《礼记》以后，以五行配四时，以政令配月令、天与人交相感应等思想，逐渐成为汉代儒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①

牟钟鉴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中肯定了该书的历史地位，认为“它对于整个汉代的学术和哲学，乃至实际政治生活，都有重大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远远超出了汉初道家的范围……要了解先秦的学术史和哲学史，固然不可不读《吕氏春秋》；要了解秦汉的学术史和哲学史，尤其不可不深研《吕氏春秋》”。^②

刘元彦在《吕氏春秋：兼容并蓄的杂家》中道：“汉王朝政治方面的特点，是王道、霸道并用。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明确地道出了这一特点。‘霸王道杂之’这个汉家制度，正是杂家《吕氏春秋》的特点。”^③指出了汉代政治制度对《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接受。

李家骧在《吕氏春秋通论》中说：“（《吕氏春秋》）开启封建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吕书对于汉代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和它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④他在《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一文中又说：“吕书影响汉以后的学术有几点：杂家书兴盛，汉时名政论家多仿吕书博采众长而成己见；宇宙论进而演化，《淮南》、王充均据吕书而发挥；天人感应观念更浓，到董仲舒更见完备系统；医学有发展，《黄帝内经》的观点名称都有见于吕书的；物候学有发展，后世《四民月令》之类等等著作都受吕书影响。”^⑤李家骧不但指出了《吕氏春秋》对汉代政治、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还指出《吕氏春秋》对汉代其他思想像医学、物候学等的影响，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吕氏春秋》的价值。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②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08、113页。

③ 刘元彦：《吕氏春秋：兼容并蓄的杂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6页。

④ 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75页。

⑤ 李家骧：《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下），《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洪家义在《吕不韦评传》中说：“刘安全面效仿《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吕氏春秋》中阴阳五行、天人感应部分的扩大和发展，他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刘向的《说苑》、《新序》，其无不或多或少受到《吕氏春秋》的影响。”^①

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有《〈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一文，重点分析了《吕氏春秋》中《十二月纪》在汉代的影响，分析甚为详尽，并且论述道：“两汉人士，许多是在《吕氏春秋》影响之下来把握经学，把《吕氏春秋》对政治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即视为经学所产生的影响；离开了《吕氏春秋》，即不能了解汉代学术的特征，这点却被人忽略了。所以为了打开探索两汉学术思想特性之门户，便应先从《吕氏春秋》所及于两汉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开始。”^②

王启才在《吕氏春秋研究》中专列一节就《吕氏春秋》对《史记》的影响做了分析，重点从学派归属、写作宗旨与取材标准、思想特点、结构体系、情节技法、语言运用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③

王志成在《〈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中说：“本文认为该书恰恰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新体新说，如果从该书对董仲舒之‘天人感应’说的成立和被视为‘中国美学的开山祖’的《乐记》的重大影响来看，《吕氏春秋》其书更是功不可没。”^④

以上诸家重点就《吕氏春秋》对汉代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的影响作了阐述，有的也兼及科技思想。但细细分析，可以发现，“影响”与“接受”之间还是有差异的。总体说，谈及“影响”，多指影响者居于主动地位，被影响者则是被动的。而“接受”则不然，“接受”应该是后来者主动学习接受前人的成果，学习者处于主动的地位，在接受时也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有所选择。从这一角度考察，前人对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接受视角的研究就少得可怜，目前见到的专门性论文有付浩宇的《〈吕氏春秋〉接受史概述》^⑤，就秦代一直到当代《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作了概述，遗憾的是，论述十分简略，全文不足五千字。

①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475页。

②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③ 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王志成：《〈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美学思想》，《齐鲁艺苑》2002年第2期。

⑤ 付浩宇：《〈吕氏春秋〉接受史概述》，《安徽文学》2008年第2期。

二 研究意义

对《吕氏春秋》接受情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 《吕氏春秋》是先秦文化的大总结，研究后代《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发掘先秦文化在后代的发展流变，进而考察中国思想文化在早期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2. 《吕氏春秋》又是战国时期秦文化、秦文学的代表，《吕氏春秋》的编撰，标志着战国时期多元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逐步走向了统一文化、统一文学。研究后代《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秦文学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由多元走向统一过程中的内在规律。

3. 《吕氏春秋》中包含了许多不见于其他先秦古籍的内容，有的概念、内容在《吕氏春秋》中是第一次出现，如书中的乐律理论、农业思想等。另外，一些先秦古籍因秦代焚书而消失，其思想内容赖《吕氏春秋》得以保存，《吕氏春秋》是我们了解这些古籍、内容的重要依据。研究后代《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对于我们考察这些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后代对《吕氏春秋》的接受，突出的表现就是学者们对《吕氏春秋》直接的评价、称引、注释、研究等，这是我们考察后代对《吕氏春秋》接受情况的重点。

除了直接的、显形的接受外，后代学者对《吕氏春秋》还有一些隐形的接受，例如对《吕氏春秋》思想、结构等的吸纳，而这些隐形的吸纳却颇不易梳理。《吕氏春秋》杂家的性质，使得书中内容既有来自其他先秦古籍的部分，同时又有作者独创的部分。总的研究思路是，通过仔细梳理，将《吕氏春秋》中对他书吸收的内容与自己的独创部分相分离，就后代对《吕氏春秋》独创部分的接受情况做重点研究。

仔细比较研究《吕氏春秋》与其他先秦子书，可以发现，《吕氏春秋》有以下特点与成就：

1. 《吕氏春秋》虽然综合了先秦诸子各派思想，但并不是简单的汇编杂凑，而是在服务于政治的宗旨下对各家做出取舍，其有利于政治的内容就吸收，对政治不利的因素就舍弃。以一定的宗旨与目的来综合各种学说，这是《吕氏春秋》的特点之一。

2. 《吕氏春秋》在综合了各种学说后，还按照一定的思想原则进行了编排。具体就是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指导，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理念来编撰各种材料。这样从全书看，是一个有机整体；从各部分看，各种学说又集中编排，保留了各种学说的完整性。全书虽然内容丰富，容量巨大，但结构完整，内容条理，层次清晰，没有丝毫的杂乱无序的感觉。独特的编排方式也是《吕氏春秋》的重要特点。

3. 《吕氏春秋》中记载有许多不见于其他先秦古籍的内容，如书中对先秦时期农家思想以及田骈、慎到、邹衍等人思想的记录，对十二律生成方法、农业技术理论、物候现象的记载等，都不见于他书。而有些思想虽然也出现在其他先秦古籍中，但较为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其文献价值远不及《吕氏春秋》，如养生思想、二十八宿的名称与位置、十二乐律理论等。《吕氏春秋》为后代学者研究传播这些思想内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也是《吕氏春秋》的特点与价值所在。

4. 《吕氏春秋》在阐述政治、哲学等思想时还引用了许多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在后代被广泛引用，有的演变成了成语、俗语等，至今活跃在我们的语言中。《吕氏春秋》本身也有较高的独特的文学成就。《吕氏春秋》的寓言故事与文学成就也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内容。

对《吕氏春秋》直接的评价、称引、注释、研究加上以上四点，就是我们考察后代对《吕氏春秋》接受情况的主要切入点。

在具体研究时，从全面钩稽文献入手，将清理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注重实证性。同时将文献考证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在认真考证文献的基础上，参照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目录学、语言学、美学、农学、天文学、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运用归纳、比较等方法进行分析总结。

研究中还遵循了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吕氏春秋》是先秦文化的最后总结，意味着从文化角度开展研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研究后代对

《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需要将考察对象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学者们吸纳了《吕氏春秋》中的哪些内容，舍弃了哪些内容，都与其所处社会背景有重要关系。因此，从文化角度对《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进行研究也是我们的重要方法。

目 录

导言	(1)
一 前人研究综述	(1)
二 研究意义	(4)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4)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编撰与成就	(1)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编撰时间与背景	(1)
一 《吕氏春秋》的编撰时间	(1)
二 《吕氏春秋》的编撰背景	(2)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编撰意义	(19)
一 《吕氏春秋》在秦文学、秦文化中的意义	(19)
二 《吕氏春秋》在诸子学发展中的意义	(22)
第三节 《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24)
一 《吕氏春秋》的文学成就	(24)
二 《吕氏春秋》的寓言成就	(30)
三 《吕氏春秋》的文艺思想	(35)
第二章 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接受概说	(46)
第一节 秦汉时期接受《吕氏春秋》的历史背景与基础	(46)
第二节 秦汉时期接受《吕氏春秋》的演进过程	(48)
第三章 秦代对《吕氏春秋》的吸纳与接受	(59)
第一节 秦代“五德终始说”对《吕氏春秋》的吸纳	(59)

第二节 秦代神仙方术思想对《吕氏春秋》的接受	(61)
一 神仙方术思想的渊源与发展	(61)
二 秦代神仙方术思想的盛行	(64)
三 秦代神仙方术思想与《吕氏春秋》相关理论的暗合之处	(65)
第四章 汉初黄老思想对《吕氏春秋》的吸纳	(70)
第一节 汉初黄老思想对《吕氏春秋》的吸纳	(70)
一 汉初政治制度对《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运用	(70)
二 黄老学的产生与发展	(73)
三 汉初黄老思想对《吕氏春秋》的吸纳	(75)
四 《黄帝四经》与《吕氏春秋》	(78)
第二节 《淮南子》对《吕氏春秋》的模仿与发展	(83)
一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相同点	(84)
二 《淮南子》对《吕氏春秋》的引用	(89)
三 《淮南子》对《吕氏春秋》的发展	(91)
四 《淮南子》对《吕氏春秋》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的吸纳	(95)
第五章 董仲舒、司马迁对《吕氏春秋》的接受与阐释	(99)
第一节 董仲舒对《吕氏春秋》的接受与阐释	(99)
一 董仲舒对《吕氏春秋》天人思想的阐释和发展	(99)
二 董仲舒对大一统封建理论的建构与《吕氏春秋》	(108)
三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新儒学与《吕氏春秋》的兼容并蓄	(111)
第二节 《史记》对《吕氏春秋》的称引与接受	(114)
一 司马迁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的称引与评价	(115)
二 《史记》的编撰目的、结构、选材对《吕氏春秋》的接受	(118)
三 《史记》对《吕氏春秋》思想的吸纳	(123)
四 《史记》历史评价标准对《吕氏春秋》的接受	(129)
五 《史记》写作方法对《吕氏春秋》的借鉴	(132)
六 司马迁所载《吕氏春秋》三大部分顺序辨析	(134)
七 司马迁的评价对后世的影响	(135)

第六章 班固、高诱对《吕氏春秋》的评价与研究	(137)
第一节 《汉书·艺文志》对杂家的阐释	(137)
一 《汉书·艺文志》之前古籍对诸子学派的著录	(137)
二 《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的学术意义	(139)
第二节 高诱注释《吕氏春秋》的成就	(144)
一 高诱《吕氏春秋序》对《吕氏春秋》的评价	(145)
二 高诱《吕氏春秋注》的成就	(147)
三 高诱《吕氏春秋注》的特点	(155)
四 高诱《吕氏春秋注》的地位与影响	(158)
第七章 汉代对《吕氏春秋》文艺、科技等思想的接受	(162)
第一节 汉代对《吕氏春秋》文艺思想、乐律理论的接受	(162)
一 汉代对《吕氏春秋》文艺思想的接受	(162)
二 汉代对《吕氏春秋》乐律理论的接受	(170)
第二节 汉代对《吕氏春秋》天文历法思想的接受	(177)
一 《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与《礼记·月令》的关系 问题	(177)
二 汉代对《十二月纪》中二十八宿记载的接受	(179)
三 关于节气记载的接受	(182)
四 关于物候记载的接受	(183)
五 汉代对《吕氏春秋》灾异说的发展	(185)
六 汉代政治对《十二月纪》思想的运用	(191)
第三节 汉代对《吕氏春秋》养生、医学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192)
一 《吕氏春秋》的养生思想	(192)
二 《黄帝内经》对《吕氏春秋》的接受与发展	(198)
三 汉代其他著作对《吕氏春秋》养生、医学思想的接受	(206)
第四节 汉代对《吕氏春秋》农业思想、农业技术理论的 接受	(208)
一 《吕氏春秋》的农业思想	(208)
二 《吕氏春秋》反映的农业技术理论	(212)

三 汉代对《吕氏春秋》农业思想、农业技术理论的接受	(216)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28)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编撰与成就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编撰时间与背景

一 《吕氏春秋》的编撰时间

《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由吕不韦主持编写的一部综合各家学说、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政论书籍。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召集宾客编撰《吕氏春秋》的动机是为了给秦国争面子，以便与战国著名的四公子一争高下。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其中还有更加深层的缘由，如为即将一统天下的秦帝国的建立和长治久安提供思想理论，吕不韦势力与秦始皇势力的斗争等。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是吕不韦在秦国时召集他门下的宾客编辑而成，写作的背景以及出发点也是以秦国为主，旨在为秦国的统治者提供治国方略。

自汉代起，《吕氏春秋》就受到关注。古今关于这部书的注释、考辨以及综述性质的专著与论文不计其数。但是，时至今日，许多关键性问题依然没有定论，如《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问题。

与其他先秦诸子书籍的确切编定成书时间难以考订不同，《吕氏春秋》中对成书时间作了明确的记载。《序意》云：“维秦八年，岁在涪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这里的“秦八年”，据清代孙星衍考证，是从秦庄襄王灭周的第二年算起，八年后应该是秦始皇六年（前241年）。因为“涪滩”是申年，秦始皇六年正好就是申年，秦始皇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年，与“涪滩”不合。^①但是《吕氏春秋》三部分是一次成书，还是分几次成书？对此，学者们分歧颇大。如牟钟鉴云：“《吕氏春秋》于吕不韦执政后期一次编纂而成，流传至今的《吕氏春

^① 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骈宇騫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页。

秋》，虽经过历代辗转抄传而出现若干讹误漏衍，但就其内容而言，即是当初布于咸阳市门而悬千金其上的那部书。”^① 而陈奇猷又曰：“《十二纪》确系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② 分歧产生的缘由有二：一、上引《序意》中载有良人问该书的主编吕不韦，只说到“良人请问《十二纪》”，并没有提到《八览》、《六论》。许多学者认为《序意》仅仅是《十二纪》的序，并不是全书的序。假如这一说法可以成立，则《十二纪》与《八览》、《六论》显然非成书于一时。二、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隐含的意思是《吕览》作于迁蜀之后。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我们从黄伟龙的观点，即《吕氏春秋》中《十二纪》成书最早，在秦始皇六年完成，而《八览》、《六论》次之，其成书时间在始皇六年之后的一年期间。^③

二 《吕氏春秋》的编撰背景

《吕氏春秋》编撰于战国末期的秦国。前人谈及战国中晚期的秦国文化，多认为物质文化发展较快，精神文化却远不及东方国家。加之秦人尚武好战，商鞅变法压制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使得后人形成了秦人重武轻文、秦精神文化落后的总体印象。如有学者指出：“秦文化的实用性表现之三就是它在物质文明方面发达，在精神文明方面逊色……秦国的精神文明则远远落后于东方诸国。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大繁荣的时代，然而秦国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和一个独立的学派。”^④

与这一说法不同的事实是，战国晚期在秦国编撰了一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在《吕氏春秋》中，儒、道、墨、法、阴阳、兵等各家思想共存，甚至各派的一些分支也有著录，为我们全面了解先秦诸子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除此之外，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人生、逻辑、教育、农业、艺术、医药、天文等无所不包，有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最高成

①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6—7页。

② 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见《吕氏春秋新校释》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③ 黄伟龙：《〈吕氏春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

④ 邱文山、张玉书、张杰、于孔宝：《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746页。

就，是先秦学术的一大集成。在精神文化较为落后、没有思想家的国家竟然编撰了这样一部集各种思想文化为一体的巨著，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疑惑，《吕氏春秋》是如何编撰而成的？

战国时期的秦国精神文化真落后于其他国家吗？仔细钩稽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战国中晚期的秦都咸阳是当时的学术中心，这为《吕氏春秋》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氏春秋》就是在咸阳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编撰而成。关于《吕氏春秋》编撰背景的形成，主要从战国时期秦国士人情况以及思想文化状况两方面进行讨论。

（一）战国时期秦国士人情况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曰：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李斯不但指出秦国重用客卿的几个重要时期，同时指出客卿对于秦国强盛的重要作用。不论出身，不分贵贱，唯才是用，重用外来人才，这是秦国自封国后一贯的用人制度。秦国是平王东迁时始立国，立国时处境异常艰难，平王赐给秦襄公的“岐以西之地”尚在犬戎手中，还常常遭受犬戎的侵扰。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秦国在人才选择上只能是唯才是用，而不能像晋、鲁等国采用“尊尊亲亲”的世袭的用人原则。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各个国君都继承了这一用人制度。因此，在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影响政局的世家大族，秦国却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可以说，秦国偏居西北，最终能够相继灭了六国统一全国，与秦国的用人制度有直接关系。

战国中后期，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势力的逐步东扩，秦国成为了当时的头号强国。秦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这一地位，对士人无疑有着莫

大的吸引力，当时的士人纷纷从各国汇聚到秦国。战国晚期，秦都咸阳已经成为了当时最为繁荣的学术中心。

战国中晚期秦都咸阳学术中心的形成，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 秦孝公时期（前361年—前338年）的二十余年间

这一时期是咸阳学术中心形成的开端。秦孝公时期一项重要的政令就是在孝公元年颁布了《求贤令》：

孝公元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①

商鞅就是在看到《求贤令》后自魏国入秦的。魏国当时文化较为发达，尤其是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在位）礼贤下士，魏国聚集了许多文人，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魏国发达的文化显然对商鞅有很大影响，商鞅就是带着魏国李悝的《法经》入秦的，“（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②。商鞅还曾师从鲁人尸佼，《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著录有《尸子》二十篇。班固注曰：“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可见，商鞅虽以法家著称，他对其他诸家思想也是熟悉的。商鞅见孝公，分别以帝道（道家）、王道（儒家）以及霸道（法家）游说孝公，也说明了这一点。

商鞅入秦后孝公任为左庶长，颁布了变法令。变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商鞅也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商鞅最后虽然被杀，但是法家思想并没有随着商鞅的被杀而在秦国消失，反而由于变法的成功，法家思想在秦国得以正式确立。在商鞅的倡导下，秦国出现了一批商鞅的后学，《汉书·艺文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晋书·刑法志》。